

触碰现实： 英语文学研究新发展

张剑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触碰现实： 英语文学研究新发展

张剑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触碰现实：英语文学研究新发展 / 张剑主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35-7337-5

I. ①触… II. ①张… III. ①英语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0245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 任 编辑 杨镇明
封 面 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337-5
定 价 59.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燕律师
物料号：273370001

文学反映现实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思想，它起源于古希腊的模仿论，然而现在它已经被视为一种朴素的“反映论”，甚至是粗糙的现实主义，而更加细腻的理论则是讨论再现的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即语言不能完整地“再现”现实。19世纪的“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y）在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上明显地侧重于强调心灵的作用，而不是现实的反映。比如文学所描写的“自然”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作者心灵的投射？华兹华斯诗歌中那朵水仙花所反映的是客观现实，还是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它是一朵真实的水仙花，还是仅仅是一种文学建构？“表现论”的回答可能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表现论”的理论基础是德国近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它在认识论上强调了感知与真实的差异，认为客观存在依赖于心灵的感知，被感知的东西有别于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文学所反映的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心灵所感知的存在。文学中的现实是心灵的建构，它包含了感知者的思想、感情、观点、情绪等因素。用亚伯拉姆斯（M. H. Abrams）的话来说，文学所反映的，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心灵之光所照亮的现实。文学上演的场所是心灵的舞台，而不是外界广阔的天地。

试图将文学与现实割裂的还有20世纪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Formalism），这包括了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作为审美领域应该独立于社会、历史和政治领域，否则它就不再是文学。应该说，形式主义所关心的是文学的身份问题，即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一个文体的边界是什么？或者如何将它与其他学科和其他文体区分开来？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形式主义理论常常将文学视为自为、自律和自足的体系，认为意义来自其内部的形式和结构，与外部因素无关，因此也没有将文学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的必要。

新批评并不是铁板一块地要求进行“内部研究”，特别是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李维斯（F. R. Leavis）的批评实践并不避讳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的结合。即使是美国的新批评，如果人们深入探讨它的批评意图，也可能发现它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纯粹，也不是如它所说的那样完全专注于审美。但是从整体上讲，新批评主张的是文学的学科独立性和审美独立性，它一直致力于将其批评活动限制在其自设的文学边界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

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起到了将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作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定义为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他认为语言不反映客观现实，而是一个与客观现实平行的系统：语言符号并不指向现实世界，而指向其他语言符号；能指不指向所指，而指向其他能指。也就是说，索绪尔“避开了整个关于语言符号最终代表什么对应物的问题。在他的体系中运行路线都是向两侧的，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而不是正面的，不是从词到物，因为这一运动，即从能指向所指的运动，已经包含并内化在符号自身之中”。

结构主义语言学实际上斩断了词与物的关系，让语言成为了自我封闭的系统，形成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解构主义将这一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认为由于语言符号只有用其他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的意义建立在符号之间的差异之上，因此能指永远指向其他能指，意义被无限地延迟。所指只是一个超验的存在（transcendental signified），语言只能捕捉到它的“踪迹”。如果词与物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就是一个独立于客观世界的领域。由于所指永远缺场，文学只能是一种语言游戏。

二

但是，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学理论都试图将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另外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冲动，那就是试图将文学与现实连接起来。20世纪的意象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试图说明，语言如果被合理运用是可能抵达客观现实的。意象派在诗歌中反对空洞、抽象、情感放

纵，转而追求具体、实在、物体感。以庞德（Ezra Pound）为首的意象派运动借鉴了中国诗歌的特点来构筑意象派的诗学，认为中文的象形文字所表现的不是概念，而是物体本身，中文诗歌是词与物的完美结合。

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在《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一文中所阐释的“汉字诗学”对意象派的理论主张，特别是庞德的意符方法（ideogrammic method），有着重大的影响。费氏认为，汉语“既有绘画的生动性，又有声音的流动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两者都更客观，更富于戏剧性。读汉语时，我们不像是在掷弄智力的筹码，而是在观看事物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意象派所讨论的不是语言是否能够到达客观世界的问题，而是已经假定它可以到达，并且要求诗歌尽力到达。而诗歌的具象化程度直接决定了诗歌的优与劣，成为判断优秀诗歌的一个尺度。

意象派的兴起与20世纪初的反浪漫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深受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意象派会高举反浪漫主义的大旗。它们在文学理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浪漫主义认为诗歌的源泉来自内心，而意象派，甚至后来的现代派，都认为诗歌的源泉来自客观世界。正如李维斯所说，“浪漫派诗人专注于感情的宣泄，缺乏对客观事物的把握”。

然而，浪漫主义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浪漫派作家的文学思想，我们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文学思想，然后以此作为指导来研究他们的作品？还是如麦甘（Jerome MacGann）所说，跳出“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以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视角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如果人们能够放弃传统浪漫主义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视角，转而以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考察，那么人们看到的图景就会完全不同。毕竟，许多浪漫派作家与他们时代的社会和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正如玛丽莲·巴特勒（Marilyn Butler）所说，浪漫主义文学的故事不都是发生在心灵之中，而是发生在外界的大舞台上。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理论导论》（1980），虽然以一本教材的形式出现，现在却已经成为一本理论经典。从表面上看，它是一本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简介，但实际上它是对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批判，最终目的是要表达作者自己对文学的一种特殊的

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他是站在一种文学理论的立场上，去批判性地介绍其他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通过批判其他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伊格尔顿所依托的理论当然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其主要观点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的创作、阅读、流通等各个环节。虽然人们从传统上认为文学属于纯粹的审美领域，但其实在表象的背后都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伊格尔顿最经典的例子可能是针对新批评的意识形态的评论。我们都知道，新批评是主张文学自律和自足的理论，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它并没有那么纯粹。新批评认为文学结构中存在各种矛盾和对立，但这些矛盾最终都在审美中达到和谐统一。伊格尔顿认为这恰恰反映了20世纪40—50年代的社会现实：各种社会矛盾，包括东西方对峙和冷战，使保守的新批评在文学中表达了对和谐统一的希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批评中有两种冲动，一是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价值，二是追求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追求纯粹审美价值的冲动往往希望把文学视为独立的领域，强调它的纯粹性和边界，以及它与其他领域的区别。追求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的冲动往往希望将文学与其他领域联系在一起，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学在这些领域的作用。

三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触碰现实》（*The Touch of the Real*, 2000）一文中，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为例，说明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必不可少的和亟需建立的互动和联系。他用很大篇幅展示了两人所使用的特殊的叙述方法，即用一个具体的、看似个案的例子来展示大历史的方法。格尔茨称之为“厚描”（thick description），奥尔巴赫称之为“氛围历史主义”（Atmospheric Historicism）。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使用的是他的人类学田野记录中的一个“生鲜”的故事，而奥尔巴赫在《模仿论》中使用的是经典文学作品的某个段落。他们通过对一个故事或一个段落的细读或厚描，往往能够揭开一个部落的文化历史或整个作品的意义，以及这个作品产生意义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格林布拉特认为，两个例子虽然都不是出自后现代批评家之手，但是它们都可以为后现代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格尔茨已经意识到他的例子的文本性，但是这种文本性与人们所说的“文本之外无现实”的观点并不相同。奥尔巴赫则专注于作品对现实的再现，对文本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毫无兴趣。奥尔巴赫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在详尽的描述中能够实现“现实的魔幻式再现”。而对格尔茨而言，“不是他的方法对我们多么重要，而是他讲述、描写和澄清的生活，而这个如此生鮮和细腻、如此粗糙和复杂的生活，正在被日益深奥的文学研究一步步驱逐出去”。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批评急切的任务就是“寻回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他的《触碰现实》一文的总体思路和逻辑方向就是要将社会和历史重新带回到文学中来。他说：“文学批评可以大胆地走向那些人们不熟悉的文本，这些边缘的、奇怪的、片断的、出乎意料的、粗糙的文化文本反过来又可以与人们熟悉的文学经典作品展开非常有趣的互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在与文化的互动中寻回“一种对现实的信心”。在他看来，当代的文学批评的确存在这样一种需要：“我们想要触碰现实，好比古代的人们想要触碰超验。”

急切想让文学触碰现实的还有当代的生态批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浪漫主义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 1991）一书中总结了近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批评史，以及它们各自显露出的问题。60年代为浪漫主义研究提供了唯心主义的批评模式：崇尚个人想象力。80年代为浪漫主义研究提供了阿尔杜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模式：纠缠于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第一种批评将人类心灵凌驾于自然之上；第二种批评将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凌驾于“自然的经济体系”之上。而他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将把浪漫主义与可能是未来10年最紧要的政治议题——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原始雨林的砍伐、酸雨、海洋污染以及英格兰绿色田野的水泥化——结合在一起。

贝特认为，在当代的浪漫主义批评中的确存在一种政治化倾向，而这种政治化似乎只涉及阶级、性别、种族和身份政治，而不包含“绿色”政治。在他看来，虽然文学在揭露当代社会的压迫和边缘化现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正在失去行动力，已经变成一种书斋游戏或校园说辞。在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文学完全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治化的可能，完全可以以一种积极的、充满行动力的面貌出现，同传

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成为一种改变社会的手段。

生态批评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文本重新引向外界，引向广阔的自然。在认识论方面，它更加唯物主义，更加强调与客观现实的结合，更加强调走出“语言的牢笼”。伦纳德·斯卡杰（Leonard Scigaj）在《当代生态和环境诗歌：延异还是指涉？》（1996）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当下流行的后现代语言观，指出语言不是一种“延异”的游戏，而是一种具有外向性指涉的表达工具。作为符号，它不指向其他符号，而直接指向外部的物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批评有诸多相似之处，至少在认识论上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是强调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对接的，用格林布拉特的话说，都有一种“触碰现实”的冲动。

四

本书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集，年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2015年6月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等国内外15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加。会议论文从政治、历史、全球化、种族、性别、阶级、生态等视角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尼日利亚等国文学进行了深入研讨，另外还有议题涉及比较研究、文学的跨媒体改编、文学教学等。

会议论文既涉及经典作品，也涉及当代作品；既涉及英美作品，也涉及其他英语国家的作品；既涉及作品细读，也涉及理论探讨。香港中文大学的赫达特教授（David Huddart）以“世界英语”为题，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探讨了英语的语言霸权与所有权问题，认为英语已经属于世界，而不属于英美。世界需要克服焦虑，视英语为已有，从而创造出不同的英语文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分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与20年代美国颁布的禁酒令的关系，解读出其中的历史、文化和道德内涵。清华大学的余石屹教授对照了费诺罗萨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的原稿和庞德编辑出版的节选版本，说明了该文对英美现代诗学、现代诗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丽亚教授以“当代英国‘传记小说’的文类特征”为题，分析了关于奈保尔的三个传记文本，说明了其中的文类特征和互文结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特蕾西教授（Steve Tracy）探讨了非洲音乐如布鲁斯和爵士乐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作用，认为它们不仅深刻影响了非洲裔美国文学，而且在美国文学整体上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南京大学的杨金才教授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本地文化和外来影响的冲突，并将此冲突追溯到莎士比亚时代，从而形成了对《威尼斯商人》的重新解读。复旦大学的金雯教授探讨了英国18世纪的性教育、激情哲学和小说中性爱描写之间的关系，从而刻画出西方性爱观发生现代性转向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的代显梅教授讨论了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如何以高于现实的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为标准，审视美国内战后各种思想价值观的冲突。杭州师范大学的殷企平教授以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隆达》为例，分析了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艺术和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结合点，即心智培育及其艺术呈现。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陈榕教授解读了《我的安东妮亚》中的边疆风景，指出这里的风景既是地域性的，也是国家性的，承载着美国民族性的“想象的共同体”。南开大学的刘英教授质疑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划分为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传统做法，认为其边界具有流动性和“文化间性”。解放军理工大学的孙红卫以北爱尔兰当代诗歌中的花木意象为蹊径，追踪现代爱尔兰诗学的沿革轨迹，阐发诗中的花草、林木承载的历史情感与共同记忆，呈现其中蕴含的乡土情怀与民族情感。深圳大学的江玉琴认为后殖民主批评可以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一个发展路径，以对生态批评研究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进行整治与文化干预。东南大学的赵建红分析了印度小说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微物之神》中所反映的全球化小说所关注的共同主题，即身份与族性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以上只是会议的部分发言，其他许多发言也都很精彩、很睿智，本论文集就是这些精彩发言的见证。从它们的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近的英语文学研究在研究视角上都具有一种走出心灵、文本、语言等各种牢笼的冲动，它们渴望将文学放入更大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去考察。《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中关于狄金森的章节也许是另一个将文学与现实结合的经典案例。狄金森是美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自我封闭的作家，她后半生都没有出过家门。然而从她的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美国内战、选举政治、

南方贵族文化、经济金融活动、科技发展等时代印记。正如这一章节的作者所说，看似最个人化的地方，其实也是最能够与文化进行对接的地方。著名文学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一篇题为《小说能够作证吗？》（“Can Novel Be Testimony?”）的演讲中认为，文学虽然是虚构作品，但是仍然能够为大屠杀作证。在我们的时代，文学不应再是书斋游戏，而应是与社会历史现实紧密联系的文化产品。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剑

2016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英国文学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

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	3
Words and Music: Shakespeare's <i>Othello</i> and Verdi's <i>Otello</i>	14
“站立等候”：弥尔顿《哀失明》的清教心路管窥	28
“线”的反叛：论威廉·布莱克的艺术“逃逸线”.....	44
人物刻画对意识形态的迁就：《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假求婚者	53
《唐璜》与拜伦夫妇分居案：	

兼论浪漫主义时期出版审查制度、女性阅读与创作.....	64
东方？西方？：济慈《海波里安》中的埃及形象.....	76
史蒂文森的文艺观与《金银岛》对传统英国历险小说的超越.....	90
打破“战壕诗歌”的权威：英国女性诗人与“一战诗歌”.....	103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论D. H. 劳伦斯《袋鼠》中深度的空间	113
W. H. 奥登的“抗日战争”——《中国十四行诗》	

对战争和政治的理解.....	128
多丽丝·莱辛小说《屋顶丽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140
殖民者的“凝视”与他者的臣服：读多丽丝·莱辛太空小说.....	147
“生命虚构叙事”的多文本结构及阐释意义：	

兼论与奈保尔有关的三个文本.....	155
作为全景敞视建筑的购物中心：A. S. 拜厄特短篇小说	
《无家可归的女人》的空间伦理解读.....	164
“为他物命名”——A. S. 拜厄特短篇小说《玫瑰色茶杯》的物品修辞..	174
虚构与现实之间——A. S. 拜厄特《巴别塔》中的自由存在	188
镜子、舞台与全景敞式监狱：析安杰拉·卡特小说中的凝视.....	198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创伤叙事嬗变	
——从《时间中的孩子》到《星期六》.....	209
石黑一雄小说中“恶的平庸”现象研究.....	219

萨拉·凯恩戏剧中的生命哲学：析《渴求》与《4.48精神崩溃》..... 229

美国文学

从文体学角度看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简约风格.....	243
论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中的商品意识与交往伦理.....	257
英美现代诗学的缘起：重读费诺罗萨的《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	273
禁酒令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285
主体的创伤：论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中 乔·克里斯莫斯的身份问题.....	297
诗歌与注释的互文结构和语言游戏：评V.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	307
旅行写作与身份认同：析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巴西组诗”.....	320
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死亡恐惧与道德拯救.....	333
从普拉斯对影片《蛇穴》的改写看《钟形罩》的反精神病学主题....	342
论普拉斯悼父挽诗中情感与意象的演变.....	359
玛里琳·鲁宾逊小说的悖论特征：以《基列家书》和《家园》为例	370

其他文学

“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源与流.....	381
异化的人生：解读库切小说《耻》中人物戴维·卢里.....	389
寻找遗忘的母亲：翁达杰小说《英国病人》中的凯瑟琳.....	399

文学理论

玛格特·汉尼曼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415
语言的牢笼：詹姆逊与他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	428
文学文本与历史的商讨——从《朵帕蒂》看斯皮瓦克与新历史主义 ...	439
World Englishes: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452



英国文学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 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守仁 林懿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如今的文化地位由多种因素造就。他本身不同寻常的文学才能奠定“文学天才”的美名，其作品以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而具有持久的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历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化批评者对其价值的挖掘使他诗名远播，他的崛起与英国的帝国建构和文化输出息息相关。本文梳理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历史过程，并思考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带来怎样的启示。

关键词：莎士比亚 英国文学批评 文化符号

2012年英国伦敦举办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段莎士比亚的经典对白“不要害怕，这个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Be not afraid. / The isle is full of noises.)传遍全球。2014年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之际，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范围发起的调查显示，莎士比亚是英国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王晓真：A01)。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一面旗帜，在全世界具有广泛认知度。人们常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国家，而莎士比亚因其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全世界许多人认识英国的文化纽带。

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确立过程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文化地位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对这一过程发生着影响。莎士比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伊丽莎白一世(1553–1603)的统治期间度过的。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登基，年仅25岁。她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有序地整顿了国家财政制度，为君主政权打下牢固的财

政基础，英国进入“伊丽莎白盛世”。伊丽莎白一世是历史上少数出色的君王之一，展现出纵横捭阖的雄才大略。1588年英西海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英国成为海洋霸主。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开始形成，世界对于英国人变得辽阔。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也伸展开来。世俗化的大潮使民众对世俗文艺的需求增大，对人的心灵的重视得到提高。英国文学顺时而勃兴，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剧作家，而莎士比亚正是这批诗人的代表，他的创作是处于上升时期英国的时代产物和文化表征。德国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曾借自己小说人物之口不无崇敬地说，“英国就是伊丽莎白，就是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那批诗人，”因为彼时英国展示了“这个国家青春时期最强有力最富激情的状态”（茨威格：130）。可以说，莎士比亚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荣光。

莎士比亚辞世不久，他作为一名民族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便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琼生（Ben Jonson）在其诗作《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吾敬爱的作者》（1623）中将莎士比亚誉为“时代的灵魂”，认为莎士比亚如同一座丰碑，其诗才超过乔叟、斯宾塞等前辈诗人，其戏剧才华甚至超越了古希腊著名剧作家埃斯库勒斯、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琼生带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推崇莎士比亚：

骄傲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
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Jonson: 160）

莎士比亚是不列颠民族的骄傲，同时他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160）琼生在诗中还指出天生的诗才是成就伟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大诗人靠后天练成，也靠先天奇才。”（160）并在多处赞扬了莎士比亚丰富的想象力、文思泉涌的创作能力这些天赋，成为莎士比亚“天才说”的滥觞。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莎士比亚的天赋诗才得到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扬等人的肯定。这些著名诗人、文学文化批评家延续且发扬了琼生表达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为英国本土作家、为莎士比亚的诗名辩护，将莎士比亚视为民族的骄傲，其中以德莱顿（John Dryden）最为突出。在《论戏剧诗》（1668）的“致读者”里，德莱顿称他的主要目的是“针对那些不公正地偏好法国作家的人的非难，为我们英国作家的荣誉辩护”（Dryden: 19）。德莱顿在文中借尼安达之口称赞道：